

# 日记中的历史

黄道炫

近年，近代史界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日记使用蔚然成风。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大批近代名人日记对外开放或整理出版，这些新资料的出现，刺激了研究者对日记的热情。比如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的开放，就吸引了海内外大批研究者前往研读，并据此写出专著、论文，一时间，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大有成为近代史界的显学之势。

日记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史学界一般的看法，多少有些谨慎。日记的个人性、主观性、随意性常常成为质疑日记可靠性的重要依据。自然，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从日记使用的实践看，过多的担心其实也大可不必，没有任何历史史料是不存在问题的，这里面的关键还在于人，在于使用者如何去面对、鉴别和使用材料。而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又只是一个基本功。

日记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固然有其局限性，却也具有其他材料不具备的优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记的即时性。日记一般是逐日记载，记下当日发生的事件或感想，记载当时，日记的主人不知道之后的事态会如何发展，因此，记载的内容、方式、视角起码代表了日记主人当时的感受和判断，是一种即时性的记载。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样的即时性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资料中，档案资料得到最多人青睐，无疑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不过，即便是档案资料，价值也不完全一样，一般而言，会议记录、审判笔录、现场报告，这样的资料由于其即时性和客观性最为珍贵。而档案中大量的总结报告，虽然也具有相当价值，但由于是事后的总结，撰写者不可避免会根据形势的发展选择性地使用和解读材料，因此已经不能再视为纯一手材料。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档案中的总结报告就一定比日记更具现场感。

关于日记的即时性，可以蒋介石日记为例，做一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入侵，蒋介石对苏俄态度复杂。1933年1月17日，日军开始压迫中国长城一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所最忌者，为我联俄与派兵入热河二事。而其志在得热河，建筑要塞，以防中俄将来联合攻满也。我第一步对俄复交，乃与以第一打击。”这时他考虑的是联苏对日。然而，1933年6月，日苏两国在东京谈判出售中东路问题，觉得苏俄出卖中国的蒋介石愤然写道：“倭寇仇我而惧我，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其目的不仅倒我，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这时苏俄又变成首要敌人了。仔细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一时期他对苏、日的态度经常颠倒反复，自身的立场常视对方的态度为依归。作为一个弱国，这样的态度其实比较符合逻辑，而蒋介石多变的想法以及形诸于日记的事实，恰恰显示了其真实心态，是日记价值的有力体现。

和日记中的颠三倒四比，1956年，蒋介石写作《苏俄在中国》时，表述的对苏态度则是一以贯之的坚定：“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读过他的日记后，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坚定只是书写的产物，日记比之事后的回忆，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除即时性外，日记还具有情感性、生活性等特征。日记个人化、私密化，不少日记主人会在日记中吐露自己的喜怒哀乐，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到当事者的情感变化，体会到当年人们

的所思所想，从中发现历史中人们的思想脉络，这是通常的客观化材料无法提供的。日记常常有关于日常生活的记载，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细节，包括物价的起落、服装潮流的变迁、饮食结构的变化、方言世界交流的手段等等，这些都是档案资料中不容易看到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价值的关于日常生活的记载并不一定出于大人物之手，倒常常见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日记中，就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言，这些小人物的日记，一点也不逊色于大人物。

举个例子，抗战时期，曾任大队指导员、连指导员等职的八路军干部刘荣，留下一部日记，整理为《烽火晋察冀》出版，其中就有大量的个人生活的记载，真实而又生动，对于了解一个时代的中共干部的心灵史大有裨益。如果不是刘荣这部日记，大概很少有人能想像到，中共党人的日记中，也会记载爱和性无法得到满足的苦恼，这是活生生的人的苦恼：“这几天，总是想理想中的对象，有时想得厉害时，同样也反映到梦中，往往在梦中是那样美满，醒来时令人多么失望难过。推想在革命队伍中的青年，恋爱问题是头等大问题，这个问题适当解决，对于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的积极心及进取心都有很大帮助，这个问题又不能适当解决，确实是常常心神不安。”“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往往会手淫，或遗精，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形成精神上苦闷。我自己生长在不幸的社会里，今天虽已摆脱，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主要因战争关系）。”

刘荣的苦恼，固然有人性的因素，也有中共阵营的特殊性。抗战时期，中共实行“二八五团”限制，即男性干部要达到 28 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才能结婚，这让很多到了结婚年龄的干部不得不承受和性的煎熬，刘荣的日记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不是这本日记活生生的关涉人性的记载，我们很难体会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与艰难，也很难想象到中共政治文化是如何深入地渗透到党员心灵深处，帮助他们克服欲望的缠绕。

当然，如同所有历史资料一样，日记作为历史资料也有其局限性。日记都是个人撰写，而就普遍的人性看，隐恶扬善是天性，即便是藉藉无名的普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日记中也会刻意选择记和不记什么，甚至会有意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记载，所以，如果单凭个人的日记了解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应该存在相当的风险。人物或事件史的研究，日记可以作为参考，但大量使用需谨慎，即使用，也要多种日记及其他材料参照使用。而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心态史，尤其是新文化史，对日记的使用就可开放得多。像社会心态史，将多种日记结合使用，从中看到社会心态的流变，应该是最便捷的路径。

同样是日记，不同的日记价值也大相径庭。很多人都说过，小人物的日记不大需要考虑未来的阅读者，多是写给自己看的，相对可信一些；而大人物的日记由于要注意自身形象，多会把日记作为装饰品，写什么、怎么写，常常有意为之，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方面，阎锡山的日记可以说是一个代表。阎的日记充斥着修身警句、励志名言，但缺乏实际事务和内心世界的记载，阅读者既无法从中看到他做了什么，也无法看到他想了什么，这样的日记，可以利用的空间就很小了。

当然，也不是说小人物的日记就一定比大人物可靠，日记主人的个性、品质也会影响日记的质量。即便是小人物，不少人也会文过饰非，担心日记被人看见，因而选择性记忆、书写；而大人物也不乏坦诚面对自己，尽量留下可信记载的案例。一般而言，如果我们从日记中读到完美的个性、一以贯之的行事方式、特别符合逻辑也特别符合日记主人判断的事件发展路径，多半就要抱有警惕，因为生活本身总是复杂多变的。正如前述蒋介石日记呈现的，无论对于一件事，还是对于一个人，颠倒反复，比之一以贯之更加符合现实生活的轨迹。过于完美的记载，通常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以茅盾女儿沈霞的日记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的冲突与复杂。1941 年，沈霞来到延安。初到延安不久，沈霞并不很习惯延安的环境，甚至抱怨：“在延安这种地方，人这么不了解人。一个青年，热血些的，都要变成冷血才会适合。”沈霞的批评是初到延安的外人

对一个陌生而又独特的政治团体的本能判断，无足为怪。接下来，她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立头脑的青年人如何被中共政治文化同化的活标本。1942年底，经过不断的学习、批评和整风教育，沈霞的想法开始明显变化，她在日记中反思先前“不是从集体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情绪出发，从个人爱好出发。因为这样，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延安同志间的爱是没有的，是缺少营养的。”作为进步的体现，则是“个人种种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再出现在我脑子中”。1943年初，她在日记中感叹：“当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时（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见真心的笑不自觉地挂在嘴边了。”沈霞做革命螺丝钉的态度，正是中共思想改造期望达到的目标。不过，历史并不总是这样简单，当沈霞为自己成为一颗革命运动中的螺丝钉而欣喜时，她又在感叹：“人是很复杂的，感情更复杂。在自己稍一疏忽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会发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在我说来，的确不像过去那样自然，是处处留心着的。精神都是提高到最紧张点。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纠正自己。……整风整得大家都严肃了，彼此看着，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说。”沈霞日记中这些思想的分支和岔道，提示天人交战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规训就完全泯灭。那些看来不那么符合逻辑的记述，恰恰让日记更显生气和可信，也正体现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追求完美是人类的天性，可是完美永远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无论对日记，还是对日记中的人和事，我们都大可不必求完美。有经验的阅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恐怕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